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特色发展研究:从特色产业到特色小镇

——基于内生发展理论的视角

范虹珏 胡 浩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繁荣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笔者认为江南专业市镇非常具有内生发展的典型性,该地区市镇能持续发展最大的驱动力来自其特色支柱产业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江南市镇特色产业的发展研究,试图从内生发展的角度分析其发展的驱动力,以期对当代特色产业小镇格局的形成与建设,提出更科学、更合理的路径创建。

【关键词】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特色;产业;内生发展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8)02-0087-1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wn in Jiangnan Reg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to Characteristic Towns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FAN Hong-jue HU Hao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prosperity of Jiangnan town caused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a.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professional town of Jiangnan is very typical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 biggest driving for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town is the development of its characteristic pillar industry.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alty industry in Jiangnan Town,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driving force of its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with a view to the 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pattern of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town, and put forward a mor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path to create.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iangnan region; town;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endogenous development

近年来,农村城镇化尤其是特色小镇创建的问题得到了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和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和策应。2014年10月时任浙江省长的李强首次提出“特色小镇”的概念,浙江率先培育的特色小镇

【收稿日期】2017-07-30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苏南城镇化模式的途径选择及内在机制研究”(SKPT2016017);江苏省博士后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模式下的农村内生发展模式的研究”(1601110B);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特色村镇的内生发展机制及优化研究”(17SHC005)

【作者简介】范虹珏(1982-),女,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与乡村治理;胡浩(1963-),男,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

充满活力,走在全国的前列。2016年8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文《关于做好2016年特色小镇推荐工作的通知》,指出在2020年打造1000个特色小镇。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全面推动。对此,建设部原副部长刘志峰在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支持的“聚势·兴镇遇见中国特色小镇”启动峰会上,对“特色小镇”一窝蜂式的盲目上马表示担忧。上海交大城市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士林指出,需警惕“小镇热”背后的盲目跟风,小镇建设亟需理性。2017年5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刊文,名为“培育特色小镇的关键是发展特色产业。”^①2016年10月,住建部公布了第一批127个中国特色小镇名单。武汉大学经管学院徐松、张司飞认为,这些特色小镇虽各具特色,但都有一个共性特点:有独具特色的产业,走的是产城融合模式。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特色小镇”如何打造特色产业、如何保持活力依然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学术界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明清时期是中国市镇发展的巅峰时期,尤以江南市镇为典型,市镇的繁荣延续了几百年。江南市镇发展独具特色,且在此后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着活力。学者对其研究甚多,经济、人口和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均有涉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现阶段关于市镇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史学的认知角度,少数涉及经济学与社会学视角,作者此前也从城镇化的角度探讨过,但总体上看是就现象本身的单一分析,学术界非常缺乏富有深度的对市镇发展的理论阐述,缺乏与现实紧密联系的整体性分析。基于此,本研究拟从管理学的视角,尝试应用“内生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来对明清时期江南专业市镇的发展情况进行理论分析。作者认为江南专业市镇非常具有内生发展的典型性,通过对江南市镇特色产业的研究,试图从内生发展的角度分析其发展的驱动力,以期对当代特色产业小镇格局的形成与建设,提出更科学、更合理的路径创建。

一、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回顾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特色支柱产业主要是蚕桑业与棉纺织业,尤以蚕桑业最为典型。即便到了现代,但凡提到丝织品,国人必然首推苏杭地区,因此本研究主要围绕蚕桑产业作为研究回顾。明清以来江南一直是中国蚕桑生产最发达的地区,江南的丝织品不但享誉全国,是富裕阶层身份的象征,而且远销海外,成为中国的象征。明清时江南蚕桑业的发展有非常鲜明的特征,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技术的日益精进。

唐代安史之乱之前,黄河流域的蚕桑生产技术代表了中国蚕桑生产的最高水平。之后随着生产重心的转移,宋代以后江南地区取代了黄河流域全国蚕桑生产中心的地位。蚕桑生产技术在明清时期持续发展,达到了传统蚕桑生产技术的顶峰。清末出现近代科学生产的萌芽,在传统技术创新的同时,引进西方近代技术和设备。

蚕桑生产技术主要包括植桑技术、育蚕技术和丝织技术。这一时期内植桑技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表现为“袋接法”嫁接育苗技术普及和桑树栽培的集中化,“袋接法”清末被介绍到了日本。育蚕技术的飞跃表现在防治蚕病技术的突破,即引入西方科学防治蚕病的技术。如江生金从法国引入微粒子病的防疫法(巴斯德法),赵敬如介绍使用显微镜检查蚕体微粒子病的技术。丝织技术的先进性是最明显的,手工丝织品工艺的最大改进体现在织物组织的灵活运用^①,如挑花结本技术,现代依然不能以机器代替手工操作,且根据织物品种配备了各种类型的手工织机。清中期之后,丝织生产开始使用工业机器。江南地区是近代民族工商业的起源地,最初就是从蚕桑生产开始引进西方机器生产的。1862

^① 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第229页。

年,引入机器缫丝车;1912年,引入飞梭提花丝织机。机器出品质量稳定,市场竞争优势明显。

第二,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化与规模化。

明清时期,蚕桑业从生产到销售专业化的分工越来越细,规模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因此蚕桑业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产业链。蚕桑业的生产此前是家庭作坊式的劳动,作为农业生产补充的副业生产活动。但是随着当地商品经济的推动,蚕桑业的生产逐渐分化为专门的桑苗生产、桑叶提供、蚕种生产、缫丝生产、丝绸生产,蚕桑业的销售则逐渐分化为单独的苗行、叶行、茧行、丝行和绸庄。

桑苗产区主要集中在双林和临平,以临平为中心,专门提供桑苗和桑叶。乾隆《杭州府志》中记载:条桑,俗名桑秧,今北关外有此市。(秧)出临平,长八尺,其鬻之地于北关江涨桥。……大者株以二厘,其产八尺……待之旁价以七分。^①乌镇是江南最大的桑叶贸易市场,“叶莫多于石门、桐乡,其牙侖则集于乌镇”^②。蚕农“除缫丝之外,又专养蛾哺子”^③,余杭是著名的产茧中心,新昌和嵊县的蚕种专业化生产程度也很高,这些地方的蚕种向整个江南地区供茧,是该地区最好的土蚕种产地。此外嘉兴、无锡和诸暨也有蚕种专业化生产,主要供应本县内蚕户。丝绸的专业化生产尤为早,《濮院琐志》中记载:织工、拽工或遇无主,每早各向通衢分立,织工立于左、拽工立于右,来雇者一目瞭然,谓之巷工^④。“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⑤道光年间,杭州、江宁和苏州还出现了三四千雇工的大型丝绸工场^⑥。“(盛泽镇)凡炼绸之坊十余,染坊三十余,踹、轴等坊亦如此,业此者近千人。”^⑦缫丝专业化生产出现略晚,约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机器缫丝厂兴建之后,主要集中于无锡和上海。近代机器缫丝业的发展带动了蚕茧市场的发展和茧行的繁荣,无锡是近代太湖地区最大的蚕茧市场和蚕茧中心。在蚕农自己缫丝的时代,凡是蚕桑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都有丝行^⑧。明清时期,即便是官营织造局也向江南的丝行购买生丝。江南地区有数量庞大的绸行(后被绸庄取代),丝绸远销海外,很多大绸庄都在外地设立了分部。

第三,早期工业化生产出现。

一般说来,桑茧的商品化较晚,丝绸的商品化较早。只有当农家自用有余或自产不足的情况下,才会与市场发生联系,……因此机器化大生产首先渗透到缫丝业和丝织业^⑨。清末我国蚕丝出口兴旺刺激了上海和无锡等地机器缫丝业的兴起与发展,由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工业化企业。1862年上海开办了中国最早的机器缫丝厂,19世纪末中国的机器缫丝厂蓬勃兴建。从1895年到1899年,全国新设机器缫丝厂66家,资本万元(内有6家缺资本记载)。其中40家在江南地区,占总数的60.6%,上海最多为18家,共有资本526.3万元(内有5家缺资本记载),资本额占总数的72.5%^⑩。机器缫丝业是当时对农村手工业影响最大的工业生产,加速了当地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的转移。

第四,生产实践与职业教育的结合。

1897年设立的杭州蚕桑馆“大旨以除微粒子病,制造佳种,精求饲育,传授学生,推广民间为第一

① 乾隆《杭州府志》卷79《物产二》。

② 道光《南浔镇志》卷21《蚕桑》。

③ 嘉庆《余杭县志》卷38《物产》。

④ [清]杨树本:《濮院琐志》卷1《杂流》。

⑤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长元两邑同人公立:《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⑥ 范虹珏:《太湖地区蚕业生产技术发展研究(1368-1937)》,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88页。

⑦ [清]沈云:《盛湖杂录》,引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1990年,第215页。

⑧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203页。

⑨ 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8页。

⑩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第1216页。

要义。”^①这是中国最早的蚕桑学校,也是中国最早的职业教育机构,是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端。江南地区第二所蚕桑学校是1899年成立的金匱蚕学会,它的主要任务是推广新的养蚕方法,培养初级蚕桑人员。1903年史量才创办女子蚕桑学堂“注重栽桑、养蚕、制种、缂丝等试验,并改良旧法,兼授普通及专门学理,以扩充女子职业,挽回我国权利为宗旨。”^②开创了女子职业教育的先河,是时代的巨大进步,女子恰好是蚕桑业生产的主力军,女子职业教育能更直接地将生产实践与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尤其是缂丝厂成立之后,1882年-1894年(光绪二十年),上海有外商丝厂4家,华商丝厂8家,工人合计9600人,其中女工占90%以上,则仅缂丝一业即有女工八千多人^③。除了专门的蚕业学校,影响较大的还有苏州农校中的蚕科专业,民国初更是建立了一批蚕学会。此前,蚕桑业生产技术主要依靠劳动者个人经验积累的传承,但随着蚕桑职业教育的兴起,近代科学栽桑养蚕知识逐渐在江南地区普及开来,同时也培养了蚕桑方面的专业人才。

二、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发展的回顾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随着特色产业的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的推动,涌现出了很多新兴的市镇,呈现遍地开花的趋势。清初江南市镇持续发展,形成了城镇群和城镇带,有不少市镇还成为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

在这其中最繁华的大市镇,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对现代小城镇格局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市镇几乎都是依靠特色产业发展起来的。明嘉靖万历年间江南地区(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太仓州、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市镇数量约为226个,到清乾隆嘉庆年间增加到410个,约万户以上的大镇有15个^④,虽然府志县志记载不尽相同,刘石吉、范金民、陈忠平等的估算数据也不一样^⑤,但是市镇数量整体上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这其中以盛泽、濮院和南浔人口最多,这三个超级大市镇都是专门的蚕桑市镇。此外还有双林镇和菱湖镇、乌青镇、震泽镇等,都是以丝织产业而闻名的小镇。以蚕桑为标志的商品化农业的发展,是带动杭嘉湖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轴心和动力。它不仅推动农村的自然经济结构向着商品经济结构方向转变,而且还促进着以消费和封闭为特征的、传统政治型城市经济结构,向着经济型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变,使城市具有生产、开放与输出的功能^⑥。蚕桑专业市镇的形成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形成特色产品生产基地,成为区域/全国的特色产品集散地。

最初是农民通过养蚕维持农户家庭的日常开支,作为农业生产的副业,当发现有利可图的时候,逐渐形成了生产销售的产业链。尤其到了清中叶之后,设立缂丝厂,工业化加剧了劳动力职业分化,加速了新市镇的形成。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发展的两次高峰,都是基于产业的突破性发展。由于蚕桑业发

①《农学报》第41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中”,第3页。

②佚名:《上海女子蚕业学堂章程》,《女子世界》1905年第6期;《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线装书局影印本,2006年。

③徐新吾:《中国近代缂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5-140页;另参见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1-92页。

④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⑤数据参考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42-149页;范金民:《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1067-1068页;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⑥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3-314页。

达而形成的市镇,清中叶之前多集中于杭嘉湖平原的湖州府、嘉兴府,杭州府和苏州府也有不少分布,清中叶之后随着蚕桑业生产和销售中心的转移,无锡和上海开始崛起。

双林镇的丝,誉满海内外“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①早在“隆庆时,归安菱湖市廛家主四方鬻丝者多,廛临溪,四五月间,溪上乡恩家货丝船排比而泊”^②“菱湖多出蚕丝,贸易者倍他处。”清末民初,菱湖镇一跃为我国的“四大丝市”之一,有“湖丝甲天下,惟出菱湖”之说^③,南浔“舍南舍北绿树浓,轧轧声彻村西东。灶燎薪蒸傍炽炭,穀回轴转如旋风。”^④光绪《平湖县志》记载:“桑叶宜蚕,向惟西南乡树之,今则城东二三十里近水处,绝无旷土,小民以此为恒产焉。”^⑤明万历《崇德县志》的“纪疆”中记载:“语溪(崇德)无闲塘,上下地必植桑,富者等候封,培壅茂美,不必以亩计;贫者数弓之宅地,小隙必栽,沃若连属,蚕月无不育之家。”盛泽是元代才出现的小村落,直到明初还只是“旧小村,万历初,尚家不连比,日可一猪”,明后期约崇祯年间“日盛,四望田畴,俱成聚落,牙集绫绸,日以万计,通衢接踵摩踏,河下轴轳触呼,日无虚刻”^⑥,乾隆年间“今则万家烟火,百倍于昔,其热闹与郡闾门埒,屈志称为诸镇第一。”(阊门是当时苏州最繁华的商业区)清末成为江南地区最大的绫绸专业市场所在地。南浔在南宋之前只是个村落,宋淳祐年间设镇,明中叶还景象荒落,到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一跃为“浔虽镇,……都会也”,清初成为江南雄镇,同治年间“阊阖鳞次,烟火万家;笮水流碧,舟航辐辏。虽吴兴之东都,实江浙之雄镇”^⑦。甚至俗语称“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⑧。景日华认为,南浔的经济拓荒与崛起则完全依靠蚕桑业。

第二,村镇规模明显扩大,吸纳更多的人口。

江南市镇增加的人口主要有三类:农业剩余劳动力、商人及农村的富裕阶层即地主进城。其中前两类与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有直接联系,第三类则有间接关系。蚕桑业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随着蚕桑业的不断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到与蚕桑生产相关的行业中。清中叶后机器缫丝业兴起,更是需要大批量的产业工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向主要是向市镇,主要是“绫绸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⑨表示明清时期,蚕桑业的从业人员主要流向村落,村落人口增多逐渐成为市镇。震泽镇“明初以村名,居民仅五六十家”^⑩,成化年间居户增至三四百家^⑪,成为吴江四个建制镇之一。嘉靖年间“倍之而又过焉,居民约八九百家,实邑西之藩屏也”^⑫。乾隆初“货物并聚,居民二三千家”^⑬。村镇规模不断扩大,到了清朝中期有些大的市镇繁华程度甚至超过城市,河桥镇的“小小昌化县,大大河桥镇”,枫泾镇

① 唐甄:《教蚕》,《皇朝经世文编》卷 37,光绪二十四年上海宝文书局石印本。

② [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 31《诡》,明万历高晖堂刻本。

③ [明]宋雷:《西吴里语》卷 4,版本不详。

④ [清]董蠡舟:《缫丝》,载《南浔镇志》,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 年,第 395 页。

⑤ 光绪《平湖县志》卷 8《物产》。

⑥ 崇祯《吴江县志》卷 2《市镇》,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

⑦ 同治《南浔镇志》卷 1《疆域》。

⑧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文瑞印书馆,1939 年,第 122 页。

⑨ 乾隆《震泽县志》卷 25《风俗·生业》。

⑩ 乾隆《吴江县志》卷 4《镇市村》。

⑪ 弘治《吴江志》卷 2《乡都》。

⑫ 嘉靖《吴江县志》卷 13《风俗》。

⑬ 乾隆《震泽县志》卷 4《市镇》。

“物阜民殷，巨贾辐辏，称邑都会”。康熙《钱塘县志》记载：“四方之民，朝西暮东，如鸟之飞，鱼之游，流寓多于土著。”^①陈忠平认为，专业城镇都比普通城镇的规模要大，它们拥有的非农业人口一般都在千户以上，大镇则多至万户^②。蚕桑业的发展也带动其他行业的兴旺，主要是服务业。崇德县石门镇，镇上油坊二十家，每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雇邻近县乡的百姓为佣，二十家合为八百人^③。市镇的繁华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村富裕阶层进城，以至于“土著安业者田不满百亩，余皆佃农也，上田半归于郡城之富户。”^④“江南烟户业田多，而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⑤吴滔选择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吴江和震泽两县 90 个例子进行统计发现，所有从农村迁入城镇者，只有 21 例迁入了县城或者府城，其余都迁入了市镇，占总数的 62.7%^⑥。

三、内生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

(一)内生发展理论的梳理

1.内生发展理论的概念与定义

上个世纪 70 年代，由于全球区域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增长极理论已无法解释当时的经济现象，因此内生式发展理论最早在区域经济发展学领域中提出，主要的观点就是把经济增长的重点集中于满足社会成员基本需求上。1975 年瑞典财团在“世界的未来”的报告中，首次明确定义“内生式发展”：如果发展作为个人解放和人类的全面发展来理解，那么事实上这个发展只能从一个社会的内部来推动^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7-1982 年中期规划目标中正式提出了内生发展的战略，“发展应是由内部发生的，……应从它的文化和固有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中汲取力量。……重要的问题是要把人及其能力视为关键因素……要灵活调整技术、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革新，使革新的每个阶段都由人民自己来承担……”^⑧日本的鹤见和子认为，内发型发展是“不同地区的人们和集团适应固有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文化遗产（传统），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和制度，有自律性地创造出实现‘发展目标’的途径，实现目标需要具备的社会状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1989）^⑨。Garofoli（2005）认为，内生发展意味着一种转换社会经济系统的能力、反应外界挑战的能力、促进社会学习，引进符合本地层次的社会规则的特定形式；换句话说，内生式发展是在本地层面进行创新的能力^⑩。

2.内生发展的方式与途径

首先是经济学者在经济学领域提出了内生发展的路径。主要有综合农村发展战略（罗迪耐尔，普特尔，1980）、集镇建设战略（约翰逊，1970）、农社区途径（弗里德曼，道格拉斯，1975）和选择性空间封闭战略（史特尔，1977）等。前两者的观点是战略政策向农村倾斜，促进其从农村向城市、农业化向工业

① 康熙《钱塘县志》卷 6《户口》。

② 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

③ 万历《崇德县志》卷 7《纪文》。

④ 乾隆《吴郡甫里志》卷 5《风俗》。

⑤ 道光《苏州府志》卷 10《田赋》。

⑥ 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以吴江震泽为例》，见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 2 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42 页。

⑦ 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 年第 2 期。

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源发展——质量方面和战略因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1 年，前言，第 2 页。

⑨ [日]鹤见和子：《内发发展理论》，东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46-47 页。

⑩ Sergio, B.: 《Is There Room For Loc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ed World》,《Cepal Review》,2005(86), pp45 - 60.

化的转变。后两者则提出通过农村区域内的资源整合来发展自力更生的农村经济。

其次是社会学者从社会价值取向、文化、科技、社会参与等方面解读内生发展的路径。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社会行动系统”理论,以单位地位和角色的“内在化”,即角色自我认同与社会化地位的价值取向来解释单位行动转化为社会行动的社会变迁与转型(1977)^①。黄高智认为,任何真正的发展都应该以一个民族的文化为基础,以人类本身为中心,这才是内源发展^②。罗朗·科兰“发挥内源发展的基础——人民参与的原动力的作用”^③。黎成魁认为,要培养科技上的内源创造力,就需要重新评价传统的知识,要选择需引进的知识,要发展适用于本国情况的新知识^④。

最后是在乡村治理中,为全球化和工业化下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宫本宪一(2004)指出通过内在式的发展,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体系,来达到居民自治^⑤;英国莱斯特大学的 Lan Bowler(1998)提出了农业内生发展的九项具体指标,认为本土是基础。

3. 内生发展理论的中国化研究

“内生式”发展的理念在 90 年代随着世界银行对农村的资助项目中引入中国,从农业、林业和环境保护扩展到农村的能源、卫生保健、妇女、供水和教育等方方面面。从而被引入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国内学者对内生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探讨。主要是通过对国外内生发展理论和模式的探讨和总结,以期为国内的乡村治理提供借鉴。涂人猛(1993)主张以农村为发展重点,采取自下而上的内源式乡村发展范式。张环宙(2007)认为此内生式发展模式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模式,它推崇多元化的发展目标,尊重当地人的利益,重视基层组织建设,试图以一条民主分散、注重文化和生态的新道路来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陆学艺(2001)认为,内生式发展模式应该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理想形态。向延平(2013)认为,区域内生发展理论强调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以人为本,自力更生,注重环境保护,寻求区域可持续发展。对于内生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学者主流观点认为该理论与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内涵不谋而合,但在实践方面还需要深入探讨和实证检验(张文明、滕艳华,2013;刘放生,2015)。近来已有学者从实证角度论证内生发展模式的应用性,总体认为传统外生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应该走内生发展的道路(胡榕、彭福杨,2011;林彰平,2013)。

总体来说,“内生发展”理论的界定主要包括三点:①引入“人的能动性”的理念,在发展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人类服务;②引入“融合”的理念,发展要避免统一模式,经济发展要与本地的传统文化、生态环境相融合,强调以本地资源为主的多元整合。③引入“自下而上”的理念,避免外部推动力的主导作用,要以内部力量来激活区域发展的功能。该理论不仅为我们指出了发展的本质,客观地反映了发展中内部各个因素的主次关系,清晰地呈现了社会变迁的内部发明创造的过程,为我们未来在设计产业特色小镇的路径中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视角和理论视野。基于此,本研究希冀引入“内生发展理论”的这一管理学的分析范式,对明清时期江南特色产业进行学理分析,其目的旨在为当前产业特色小镇的创建,提出更科学合理的路径,塑造以产业为核心的发展格局,最终实现

① [美] 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第727页。

② 黄高智:《文化特性与发展:影响和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内源发展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9页。

③ 罗朗·科兰:《社会交流和大众参与发展:传统与现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内源发展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57页。

④ 黎成魁:《科学和技术:内源发展的选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内源发展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5页。

⑤ [日] 宫本宪一著,朴玉译:《环境经济学》,三联书店,2004年。

产城融合的模式。

(二)基于内生理理论的分析

民居所聚谓之村,商贾所集谓之镇;贸易之所曰市,市之大者曰镇^①。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江南市镇的发展,既不是依靠行政力量发动的,也不是依靠城市和县级城镇辐射带动的,而是附近的乡民围绕日常商业性活动而自然形成的^②。作者认为:江南市镇多数是专业市镇,基本上是靠本地支柱产业(主要是棉纺织业与蚕桑业)形成的。从内生发展理论的角度来审视当地的蚕桑业持续发展的现象,与依靠内部力量有着极大的关联,正是当地的民众善于追求产品创新、掌握市场信息和利用本地资源,才使得当地的蚕桑业独树一帜。

第一,能动性的发挥:追求产品特色,保持产业活力。

(1)对生产技术的改良

主要体现在传统生产技术的改良,如湖州在缫丝技术上发明的“美丝法”:一曰出口干,即结苗时用炭火烤;一曰出水干,则治丝登车时,用炭火四五两盆盛,去车关五寸许。运转如风时,转转火意照干,是曰出水干也^③。“美丝法”缫丝一来使得蚕丝干燥速度加快,二来使得蚕丝色泽光亮韧性好。清末还出现了以湖州特产“莲子种”作原料的“细丝”,且“细丝”对手工要求特别高,只有湖州地方有生产,其他地方只有“肥丝”。《湖州府志》就记载:“缫丝莫精于南浔人。”^④同治十二年,南浔周申泰丝号聘请震泽的双杨镇人仿效日本缓丝法改良辑里丝经制法而制成“东洋经”,又称“辑里干经”。“辑里干经”具有色白、均匀、质韧的优点,“其价格与品质与机械丝相颉颃”^⑤。清末,则有对西方近代养蚕技术的学习,如巴斯德消毒法来防治蚕病,但是主要还是对传统技术的改良。

(2)对生产工具的改革

主要体现在引进西式机器生产,“欧美各国,恃机器为之助,故其工商日益发达;吾国畴昔昧乎此义,摒绝机器而不用,故其工商日就衰落。盖用机器则产力速而取价廉,不用机器则产力钝而取价贵;用机器则工作精而物质良,不用机器则工作简而物质劣。”^⑥近代中国传统丝织生产的改进,是将生产工具的革新放在首位的。江南地区引进的新式生产工具包括早期的机器缫丝车、飞梭提花丝织机,以及后来民国初的电力丝织机、煮茧机器。因此当时中国缫丝机器的中心在无锡,而上海则是电力丝织机的中心。

第二,资源的整合:开发自然资源,利用社会资源。

(1)对人力资源的利用

根据统计,明朝该地区总人口约为700万,超过宋朝300万人口的1.3倍;到了清朝嘉庆年间人口约为2015万,又是明朝的2倍^⑦。在江南地区土地面积基本持平的情况,由于人口数量激增,人均土地占有量急剧减少。人多地狭,剩余劳动力过多,显然发展农业就是不合适的途径,而蚕桑业恰好是劳动密集性产业,明代中期之后“即使在官府丝织业集中的江宁、苏州、杭州等城市,民间丝织业在人数

① 乾隆《苏州府志》卷19《乡都》。

② 范虹珏、刘祖云、曾博涵:《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劳动力转移》,《中国农史》2015年第2期。

③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④ 同治《湖州府志》卷31,《舆地略蚕桑(下)》。

⑤ 南浔镇志编纂委员会:《南浔镇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84页。

⑥ 娄风韶:《策进振亚织物公司商榷书》,苏州市档案馆藏。

⑦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研究课题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3页。

和产量上也已超过官府丝织业。”^①尤其到清中期后,缫丝厂的成立,吸纳了大批的产业工人,所需劳动力数量更超手工工厂数倍。

(2)对水资源的开发

“江南水乡”是这里的代名词,不少市镇的名字都来自于与“水”相关的地理环境,如“泽、浔、浦、桥、湾、湖”等等。江南地区水稻土占整个耕地面积的74.5%,这种肥沃的水稻土含水量较高,非常适合桑树的生长。其中最合适的是杭嘉湖一带,“苏省蚕桑县分,不较浙小,惟香桑最盛之锡澄武宜各县,地势既高,地势平坦,宜于稻作”^②,“浙西之嘉湖二郡土最宜桑,而湖桑尤为盛。”^③而桑树属于需水量较大的作物,其一生中,叶片含水率约70%-80%,枝条58%-61%,根54%-60%^④。高品质的丝对水质的要求也比较高,《研北居锁录》中说“雪荡穿珠湾,俱在(南浔)镇南,近辑里村,水甚清,取以缫丝,光泽可爱,所谓辑里湖丝擅名江浙也。”长兴“水之佳者以三若得名,而上若为最。其水较他处之水清而且重,取以缫丝则色白而光润,又增分两也。”^⑤双林“汲龙山逕水擒之,以其水清,丝绵特肥白也”^⑥。

第三,市场的把握:掌握供需信息,迎合市场需求。

(1)对高额利润的追逐

《广香桑说》记载:“栽桑原以饲蚕,然不饲蚕而栽桑亦未始非计也。栽桑百株,成阴后可得叶二三十石。以平价计之,每石五六百文,获利亦不薄亦。”^⑦湖州一带俗语:“一年两季蚕,相抵半年粮。”《吴兴掌故集》:“大约良田一亩,可得叶八十箇,每二十斤为一箇,计其一岁垦勸壅培之费,大约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⑧《补农书》中记载:“况田极熟,米每亩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间有之,大约共三石为常耳。地得叶,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管,少亦四五管,最下二三管。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矣。”因此“‘种桑三年,采叶一世’,未尝不一劳永逸也,弗思耳。”^⑨“丝绵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⑩同治《长兴县志》记载道:“农桑并重而湖俗之桑,利厚于农。自夷人通商,长兴岁入百万计。……乾嘉之际,大利未兴,……而数十年来其利倍徙。”^⑪

根据李伯重的推断,明代后期就净产值来说,桑园与稻田的实际比例大约为2:1,亦即桑每亩产值是稻的2倍上下。到了清代,蚕桑业的利润比明代更大。乾隆年间,在一般情况下,每亩桑地的收益,相当于良田或中等水稻田收入的三点三六倍至四点三倍^⑫。由于栽桑养蚕的利润远远超过水稻种植,因此很多稻田改种桑树,以至于江南这样的“鱼米之乡”到了明清时期成为缺粮地,需要大量从湖广运输米粮。《云仙杂记》记载南浔:地狭人稠,本地所出之米,纳粮外,不足供本地之食,必赖客米接济。唐甄在《教蚕》中指出:自明后期到清康熙二十年(1681)前后,杭州府田减了30顷,而地升了184顷;湖州府

① 刘克祥:《蚕桑丝绸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② 葛敬中:《苏省蚕业之真正危机及其挽救方策》,《江苏建设月刊》1935年第2卷第3期第21页。

③ [清]沈练撰,仲学谔辑补:《广香桑说辑补》,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藏书清光绪二十三年(浙西村舍刻本),原序一。

④ 洪璞:《明代以来太湖南岸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吴江县为中心》,中华书局,2005年,第25页。

⑤ 同治《长兴县志》卷8《蚕桑》。

⑥ 嘉庆《东林山志》卷21《方产志》。

⑦ [清]沈练撰,仲学谔辑补:《广香桑说辑补》,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藏书,清光绪二十三年(浙西村舍本)。

⑧ 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13《物产》。

⑨ [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01页。

⑩ 乾隆《吴江县志》卷5《物产》。

⑪ 同治《长兴县志》卷8《蚕桑》。

⑫ 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1页。

田减了 79 顷,而地升了 28 顷;嘉兴府降升幅度最大,田减了 1354 顷,而地升了 1560 顷^①。这里的田是指种植水稻为主的粮食作物用地,地则指的是种植桑树等经济作物用地,田减地升,也印证了当地对种桑养蚕的追求。清中期后就连并不宜种植桑树的山地丘陵也掀起了种植热,安吉“山多田少”“西北乡饲蚕多”“家皆贸米为食,……夏秋间常藉客米以济,市贾皆从下路籴米。”^②

(2) 对市场需求的迎合

丝织市场的产品,无论是生丝还是丝绸成品,市场的需求量都很大。江南地区的生丝与丝绸的质量首屈一指,因此丝织消费市场以江南地区的产品为主。丝织品是富裕阶层的象征,官方是国内市场的需求主力,“吴绫,唐时充贡。今郡惟吴江有之。”^③ 官方织造局所需生丝原料也都使用湖丝。西南、西北少数民族所需的绸缎均来自于江南地区,“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吴丝之盛,惟此一区。”^④ 时人也感慨“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纴,而三吴为最。”^⑤ 吴承明、范金民和李伯重三人曾对 19 世纪之前江南地区生丝和丝织品外输在全国各地的数量^⑥ 进行过统计,虽然数据不一,但是无一例外显示,输出规模飞速增长。

清代前中期中国海外输出丝织品中,江南产品占垄断地位^⑦。虽然广东成为其主要的竞争对手,但是因为江南产品质量更佳,广东产品的输出量从来无法与江南相抗衡。……上海 1840 年代初向西方国家开放之后,这种情况更加突出。1846-1853 年间从上海和广州输出的中国生丝中,由上海输出者占 80-94.6%^⑧。乾隆二十四年(1759)《李侍亮奏请将本年洋商已买丝货准其出口折》中: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其货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卖与各行商转售外夷^⑨。

四、参照当下的产业特色小镇建设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市镇的发展,落实到个体有兴衰,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数量不断增加,人口不断增多,尤其在清中期乾嘉年间之后。王家范先生认为:作为周围乡民商贸的集散地的市镇寿命都很长(除非遭兵燹毁灭性打击)。少数大镇的繁华(如南浔、盛泽、乌镇、南翔)必依赖丝、棉等跨地区的贸易发达而成气候,对如今的小城镇化的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见特色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对专业化市镇起到支柱性的作用。至今,江南的蚕桑生产依然是中国蚕桑生产最发达的地区,这里的城镇化也依然是中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① 唐甄:《潜书》下篇下《教蚕》,转自范金民:《明到清前期江南蚕桑生产述论》,《古今农业》1992 年第 3 期。

② 乾隆《安吉州志》卷 8《物产》。

③ 光绪《苏州府志》卷 12《物产》。

④ 乾隆《杭州府志》首卷《天章》引。

⑤ 张瀚:《松窗梦语》(序于万历 21 年,1593)卷 4,第 22 页。

⑥ 吴承明认为:明代后期江南输往国内其他地区的丝织品数量,每年大约为 30 万匹,值银 30 万两。范金民估计:16 世纪后期江南每年输往国内市场的丝制品大约为 54 万匹湖州绢,值银 38 万两。到了 19 世纪初,数量急剧上升为大约 1400 万,濮院绸,值银 1500 万两。李伯重认为:江南输往中国国内的丝,应该是从 17 世纪初期的 21000 担增加到 19 世纪中叶的 61000 担,丝的总产量从 42000 担增加到 90000 担。

⑦ 全汉昇:《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1 年第 4 卷第 2 期第 345 页。

⑧ Li, Lillian:《China's Silk Trade—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 1842-193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见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 1620-18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13 页。

⑨ 《李侍亮奏请将本年洋商已买丝货准其出口折》,见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史料旬刊》第 5 期,见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317 页。

在经历了较长时间以村镇衰败为代价的激进城镇化进程后,目前,中国村镇重建与发展的议题成为困扰党委政府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因此在掀起“特色小镇”热的过程中,政府、学术界和大众媒体都逐渐意识到,特色小镇的活力在于产业特色。杨乐渝说:产业是特色小镇的魂,小镇发展的核心不在于开发,而在于产业运营。基于“内生发展理论”的视角,审视之前的明清江南蚕桑业发展的历史,对现代产业特色小镇建设的启示,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追求技术创新,保持产品的独特品质。如果说特色产业是产业特色小镇的灵魂,那么产品的独特品质就是特色产业的生命力。生产—科研—教育三者的相互配合,通过一体化的系统运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将不同的社会资源和分工协同化和集成化,达到技术上的创新与实践的对接。只有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才能保持特色产品的独特性、优质性与多样性等特征,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进而保持产业的活力与市场竞争力。其次,发挥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打造区域品牌。特色产业是特定区域条件下形成的,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对于产业的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依托现有资源,根据资源禀赋的有关因素,选择产业和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向。同时,扬长避短,化劣势为优势,创造出地区品牌,逐步形成具有鲜明地域性的支柱产业。第三,形成产业链,吸纳更多就业人口。特色产业最理想的状态是“产业集群”,发挥集聚效应,形成完整的生产加工与销售产业链。社会分工明确,生产加工销售环环相扣的完整产业链。一方面保证了产品的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有利于创新氛围的出现;另一方面产业的集聚效应,能够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吸纳更多的从事产业本身的劳动者以及为此服务的第三行业的劳动者。同时由于经济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带动了区域社会结构的变化。

时过境迁,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特色小镇的打造,不仅仅在于产业发展,还有生态、文化的融合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等方方面面,但是产业将始终是特色小镇能够立足和发展的根本。

~~~~~  
(上接封三)

期的复杂的任务,既要坚持又要慎重,把改革与发展有效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探索,使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和正确的政策,这是发展农业科技事业的一条普遍规律。

刚刚胜利闭幕的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精准扶贫,一个不能少,进而提出“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为全国、全党,也为中国农业科学院提出了奋斗目标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在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农业部和有关部委的支持下,在唐华俊院长、陈荫山党组书记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下,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研究制定新的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新时代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科研院所为战略目标,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工程,以改革推动创新,以改革推动发展,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把农业科技建成强国而努力奋斗。

预祝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新时代以新的使命要求自己,而创新和发展、努力攀登农业科技高峰将是其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将在科学的征途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